

从索绪尔看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王铭玉 于鑫

摘要：本文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索绪尔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其语言符号系统思想使人们对语言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并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多视角、多元化的时代，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我们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学，发展趋势

On the Trends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ussure's Semiology

Wang Mingyu, Yu Xi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summary of Saussure's semiology and an outlook into the future trends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Saussure's theories set the objects and methods for linguistic studies, and take a look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s,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As linguistics grows into a multi-perspective and diversified discipline, we need to make further developments based on Saussure's academic legacy.

Key words: Ferdinand de Saussure, linguistics, future trends

一、引言

索绪尔界定了一系列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提出了语言学的任务，阐明了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向，从而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索绪尔

是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但首先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而且界定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与语言学的关系。索绪尔去世百年以来，其语言符号思想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本文在总结索绪尔主要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展望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二、索绪尔对 20 世纪语言学的贡献

我们认为，索绪尔对 20 世纪语言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对语言研究对象的界定

索绪尔借助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观念（语言—言语，共时—历时，内部—外部）构建了现代语言学的大厦，他通过“同质化”的取舍原则对语言学进行了“提纯”，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索绪尔之所以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共时的、内部的语言，是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当时语言学中使用的术语极不妥当，需要变革，“语言学的对象就像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①，需要开展“同质化”运动，去除语言研究中的异质因素。

索绪尔的同质化运动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使语言研究有了客观的、可实证的基础，使研究者在研究中把眼光放在存在于集体意识的语言规则上，研究者可以达成共识，可以有共同的参照标准。”^②可以说，正是同质化运动，使语言学具有了科学的性质，并在一个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兼具自然和人文属性，只用单纯的“同质化”方法来限制语言研究对象具有不足之处。语言中有许多“非科学”的人文因素，与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语境、认知活动和文化背景相关联，抛开这些因素只在形式层面研究结构关系是不够的。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同样不可或缺，它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释性要素，从而更逼近语言的文化现象、交际工具、认知产物的本质。事实上，索绪尔本人也没有完全否定语言的人文因素，只是觉得那是“外部的”和“次要的”。近几十年来，正是这些“外部”和“次要”因素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为语言学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①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页。

^② 陈保亚：《20世纪语言研究中的同质化运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二）对语言符号本质的认识

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合而为一，如同一张纸的两面。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和线性的特性。

索绪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语言的符号本质问题，并将语言研究纳入了其预言出现的新学科——符号学的范围。这一符号学语言观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今天，语言符号系统的思想已经被普遍接受。符号学也已经日渐成熟，其理念还被文学、文化学、艺术研究等广泛借鉴，在人文科学中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但是，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也并非毫无争议。后人对它的质疑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符号是否具有任意性？语言学界对符号任意性原则一向多有质疑。尤其是“像似性”（iconicity）理论提出之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它来推翻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有的学者认为像似性只是在某些方面对任意性的补充；还有的学者认为任意性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任意性和像似性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不管怎样，关于任意性的讨论导致了人们对索绪尔思想的反思，加深了对语言符号本质的认识。对像似性、象征、隐喻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语言研究的深入。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符号的能指不但与所指密不可分，甚至还会反过来影响所指。这打破了思维单向影响语言的传统观点。相应地，在语言学中人们开始研究语言与思维、世界观、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关系，“语言个性”、“观念分析”、“语言世界图景”等课题引起了广泛探讨。

其次，语言符号研究中是否应考虑“人”的因素？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是通过社会规约建立起来的形式系统，具有“集体特性”，是“社会产物”。符号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具有强制性。可见，索绪尔眼中的语言符号排斥了符号使用者的因素。而许多语言学家认为，抛开思维认知因素研究语言符号是不完整的，割断了语言与世界、人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另一位创始人皮尔斯认为符号是媒介（representatum）、对象（object）和解释（interpretant）的三位一体，符号活动是从“媒介”到“对象”到“解释”的过程。“符号代表的对象经过解释后，还可以再解释。也就是说，符号活动过程永无止境，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① 这种观点把符号的使用与人的认知活动联系起来，比静态的、抽象的符号系统解释力更强。

^① 郭鸿：《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外语研究》，2004年第4期。

(三) 对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探索

索绪尔反对分散、孤立地研究语言现象及其规律。他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物质实体,是由互相联系着的价值构成的系统,分析语言就是揭示出构成语言现状的价值系统。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单个符号并无意义,而只能从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差异、对立)中去获得意义。“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①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即是语言符号系统中两种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语言系统中同时运作,并且互相制约,全部语法就是要描写这两种关系。

索绪尔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时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②。结构主义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语言被看作是典型的结构体,必须在系统中对各个语言单位进行描写。每个语言单位都依赖于相邻的单位并受相邻单位的制约,下级语言单位通过有机的内部联系构成上级语言单位。

结构主义语言学占据了20世纪上半叶语言学的主流,但它以静态地描写语言单位为主,对语言的意义方面、认知方面、交际方面、社会文化方面都关注不够,解释能力有所欠缺。因此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语言研究流派突破了结构主义的方法框架,比如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等。近些年来,语言学研究更是受到了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是对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反叛。现代主义总是力图达到统一性、总体性、客观性、固定性和永恒性;而后现代主义恰恰相反,追求多元性、差异性、变化性、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在其影响下,语言学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进行研究。语言不但被看作是符号系统,还被看作是交际工具、社会文化现象、思维认知产物等等。而对语言的这种多视角的研究正符合语言的多维本质。

三、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索绪尔去世百年来,围绕着对索绪尔的继承与批判,语言学迅猛发展,成为一门“领先的科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语言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这一时期的语言学主流是索绪尔语言

^①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0页。

^② 通常,在语言学史上,索绪尔并未被归为结构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是索绪尔之后产生的一种理论体系。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为代表。

学说的延伸和发展；在此之后，语言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变为对索绪尔语言理论中薄弱环节的冲撞和突破，语言观和研究方法的分野使得当代语言学呈现多元化的状态。

我们认为，当代语言学主要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一）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展

1. 从语言体系到言语交际

近几十年来，语言学不再把语言体系作为自己的唯一研究对象，其视野正向言语活动和言语机制延伸。以“言语”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迅速兴起。言语交际研究中必然涉及许多语言系统外的因素，即索绪尔抛弃的“外部因素”。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些“外部因素”也是重要的关系要素。正如戚雨村所言：“人是使用语言的主体，人们正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文化中使用语言的。”^①

2. 学科交叉、融合

索绪尔使语言学摆脱了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当今时代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已成为普遍趋势。首先，语言学内部分支学科彼此间交叉、融合，各分支学科不仅要吸收并采用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要通过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来对自身进行完善。比如，语义学和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交叉，产生了构词语义学、句法语义学等。其次，语言学还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广泛的交叉、融合。比如，与社会科学交叉产生了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交叉产生了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

3. 语义研究处于中心地位

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法都不太关注甚至回避语义的研究。但20世纪中叶以来，受“意义中心论”的影响，语言学各流派都明显地转向了对语言意义问题的关注。在美国，乔姆斯基的反对者与乔姆斯基就“语义地位”问题的论战直接促成了各功能语言学流派的产生。今天，语言已不再被看作是纯形式结构，对语言单位的意义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使语义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都把语义当作重要的研究对象。

^① 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页。

(二) 研究方法由单一转向多元

1. 语言研究层面的多元化

传统语言学认为存在四个语言结构层面：句子、词、词素、音位。但当代语言学已经突破了这些结构层面的限制，如对大于句子的句群、段落、篇章，小于音位的“区别性特征”，以及中间结构层面（如短语、小句）进行研究。同时，对各个结构层面的研究还由单纯形式结构分析转向多维结构分析。比如，对于句子，不但分析其语法结构，还分析其语义结构、交际结构。我国汉语界因此提出了语法（syntactics）、语义（semantics）、语用（pragmatics）“三个平面”的语言分析方法。对结构层面的研究还与“外部因素”相结合。比如，认知语言学提出的“认知结构”概念把词与人的认知心理联系起来，而文化语言学提出的“观念分析”方法则把词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研究。

2. 打破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路

索绪尔的二元对立方法是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后世语言研究者广为借鉴。比如，语法中的许多范畴（如可数—不可数、主动—被动、及物—不及物、单数—复数、简单句—复合句等）都是二元对立的。但当代语言学提出了“连续性”和“梯度”的概念，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人们认为，语言符号往往并不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其特征往往是呈现梯度的连续统，即模糊的变量。除了典型的特征之外，还可能有“中间状态”。认知语言学提出的“原型”、“家族相似性”、“认知显著性”等概念正是基于这一思想。

3. 语言比较研究更为深入

比较方法运用于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对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进行历时的比较，目的在于探求其历史渊源，发现其变化规律，重构其共同原始语。索绪尔之后的比较语言学更注重对不同语言进行共时比较，以描述语言的异同，探索语言的共性。比较的对象也从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扩展到篇章、语用、语义。语言文化的对比也受到广泛关注。通过语言文化对比，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国情学、文化翻译学等学科得以迅速发展。此外，语言比较的方法还用于对同一种语言中的正确的、错误的和可接受度较差的相似语言结构进行对比，以便准确地找到语言材料的关键特征，进而提出合理的假设与解释。

4. 归纳和演绎相结合

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田野调查，收集和描写语言事实，归纳出语言系统

的规律。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演绎法也被广泛应用于语言研究。比如，生成语法学派就是先设定语言的规律，因为该学派认为，人脑像一个黑匣子，只有通过构造模型的方法才能破译它。这个模型具有普遍性和生成能力，是一个“输入—输出”系统。与演绎法经常一起使用的还有归谬法，即基于部分语言材料先提出理论假设，然后用更多的语言材料验证其合理性，如果发现假设存在缺陷，就进行修正。如此循环往复，使假设逐渐接近“真理”。

5.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传统的语言研究多采用定性的方法，运用观察和思辨，对语言系统的不同因素和层面进行描写、比较和分析，从而找出规律，提出理论模型。客观地讲，定性方法的价值是不可抹煞的。但定性研究的随机性和主观性较强，必须通过定量方法加以补充和完善。定量方法即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侧重或结合。近年来，定量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多采用实验的方法，而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多采用统计的方法。而且，在许多定性研究的传统领域（如语法学、修辞学、文体学等）也开始广泛引入定量研究。

（三）语言应用研究广受重视

自索绪尔以来，语言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语言应用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以至于语言学被称为“象牙塔”中的游戏。而近几十年来，语言应用研究受到广泛重视，语言学不仅能让研究者获得一种智力上的满足，而且还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比如，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开始直接与国家政策、信息产业、知识经济挂起钩来；对语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破案的程度；对语言障碍的研究与医疗目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们看到，语料库被广泛应用于词典编纂、语言教学和翻译领域；词汇和句法理论已成为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基础，并直接为机器翻译服务；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大大促进了外语教学和语言测试的改革和发展等等。

在语言学内部，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应用语言学应运而生。它着重解决实际问题，一般不介入理论上的争端，但它与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相互补充。可以说，应用语言学是检验各种理论的实验场。应用语言学可分为一般应用语言学和机器应用语言学，前者主要研究语言教学、词典编纂、翻译、言语矫正等；后者主要研究语音合成、情报检索、机器翻译、文字信息处理等。

语言学理论还被广泛应用到语言学之外的领域。比如组合、聚合关系理论被用于符号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学戏剧研究、民间故事形态学以及音乐、电影等领域；语法分析理论被用于人工智能、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语言哲学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前沿；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理论被用于失语症治疗、儿童言语发展等领域；社会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例如美国政治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语言研究课题——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其目的是用语言调节政治，寻找新的称名或政治委婉语以避免种族、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矛盾。

（四）语言研究的目的从描写转向解释

描写是对语言事实作细致的刻画，从纷繁的语言现象中寻找规律；解释是对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阐释，使人知其所以然。重视解释是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之一。

语言学从研究目的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规定性的、描写性的和解释性的。

“从古希腊语法一直到 18 世纪的语言研究，属于所谓的传统语法，都是规定性的。它们大都以拉丁语法为模式，以古代名家的文句为标准，把一些规则强加给其他语言，强加给当时的口语形式。”^①显然，这种规定性的语言研究缺乏科学性。

19 世纪，描写性的语言学开展萌芽。20 世纪之后，以共时描写为特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渐渐成为欧美语言学界的主流。这个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不论是日内瓦学派提出的关于语言学研究的一整套基本概念，还是布拉格学派关于音位系统和音位特征的理论；不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关于语符的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精细地对美洲印第安语的探索，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对语言的描写。

虽然 19 世纪盛行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已具有一些解释性的因素，但语言学真正走向解释是从以生成语法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开始的。乔姆斯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曾公开提出存在着描写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学，语言理论的强弱决定于解释能力的强弱。他认为，作为一门科学，语言学不应该仅仅以描写和分类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的目标是对人类利用有限的语言符号生成无限的话语的能力做出解释。与形式语言学一样，功能

^①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年，第 326 页。

语言学也以解释语言普遍现象作为主要研究目的。只不过形式主义语言学主张从语法系统内部寻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一种交际形式和社会产物，从语言系统外部寻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

20世纪中叶以来，解释语言学成为语言学的主流。在今后较长时间内这种趋势仍将延续。但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描写与解释。它们是相辅相成、互为发展动力的，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在今后的语言研究中，对语言现象的细致描写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五）语言认知研究方兴未艾

从20世纪后期以来，认知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认知语言学开始形成、发展。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创建、学习和运用都必须通过认知加以解释，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近年来，在语言学领域中，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尤为迅速，其理论极具解释力，并恰恰抓住了传统语言学的薄弱环节。

“认知”概念最初产生于心理学领域。所谓“认知”，就是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人脑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人通过认知活动把对客观世界的经验概念化和结构化，从而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言语活动实质上是认知活动，应从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出发，借助认知主体与外在现实相互作用形成的认知结构来解释语言结构。

当代认知语言学有如下主要观点：对语言的描写和解释必须参照人的一般的认知规律；言语的生成和理解都是主动的意义建构或信息加工过程，交际者是认知的主体；意义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也不在语言系统内部，而是一种心理现象，意义的形成和理解要借助人脑中的认知图式；在人的认知活动中，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语言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句法不是自足的形式系统，句法结构的任何变化都伴随语义的变化；等等。认知语言学提出的许多新概念（如“范畴化”、“原型”、“框架”、“意象”、“图式”、“语法化”等）使人耳目一新，同时又可以很好地解释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

总之，认知语言学动摇了索绪尔以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和语言系统运行的独立性原则，体现了语言研究中“人”的因素的回归。它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中最为热门、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新的理论不断涌现。不少学者断言，21世纪的语言学将是认知语言学的时代。但我们也应看到，相对于语言学的传统领域，认知语言学还很年轻，其

理论目前还比较零散，系统性不够强，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六) 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

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语言的静态描写。而事实上，语言本身是发展变化的，言语活动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近几十年来，重视言语交际过程和语言的历时层面，具有动态性特征的语言学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发展较为迅速，比如研究语言使用中的意义的语用学，研究口语特点的口语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结构在社会环境中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社会语言学，等等。

语法是静态研究的传统领域。但最近几十年来，功能语法、交际语法、认知语法的兴起为语法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注入了动态的因素，突破了传统语法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比如，俄罗斯的功能语法提出“从语义到形式”的研究方法，着眼于说话人组织话语时对语言素材的动态选择，研究每一个语义范畴在不同语境下的各种表达手段。

静态研究着眼于语言结构的表层状态，而动态研究注重语言结构的生成过程。因此，动态研究往往对句子生成过程中的基础层面和过渡层面进行分析。比如，生成语法在不同时期提出了“深层结构”、“表层结构”、“逻辑式”、“语音式”等结构层面和“转换”、“投射”、“移动 α ”、“语段推导”等句法操作手段，用以解释句子的生成过程。

(七) 语言研究向细致化和精确化方向发展

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总是由粗略到细致，由模糊到精确。语言学的发展同样如此。

一个世纪以来，语言学的内部区分日益细致。在索绪尔时代，语言学还谈不上有什么分支学科。后来笼统地分为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内部划分更为细致：语音学中分出了音系学、音位学、重音学等；词汇学中分出了成语学、词典学、专名学、词源学等；语法学中分出了词法学、句法学等。此外，还有众多的新兴、交叉和边缘学科。如果索绪尔能够看到他身后的语言学如此“家族兴旺”，想必也会十分欣慰。

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日益精确化。语言研究中广泛采用模型化、符号化、程序化、量化等方法，注重推理、论证过程的可操作性。形式语言学对此尤为重视。近年来，一些功能语言学派也积极采用这些研究方法，避免研究中的主观和武断。当代语言学中研究成果的表述也日益精确，比如对于

句法结构，甚至句子语义结构，都普遍采用元语言和形式化的描写，以避免自然语言表达的模糊性和多义性。

以上我们对语言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做了粗浅的阐述，涉及了语言学的对象、方法、目的、任务诸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研究的多元化导致了这些趋势只是针对主流而言的，而在个别、局部问题上，可能会出现兼向发展，甚至逆流发展的情况，这是允许的，也是正常的。

四、结束语

总之，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后人或者继续和发展，或者质疑和批判。但毫无疑问，索绪尔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正是他构建了当代语言学大厦的基础。从总体来看，当代语言学并未走出索绪尔设定的基本框架。其语言理论所具有的概括性、深刻性和前瞻性是后人无法比拟的。

如果把百年看作是一个轮回的话，今天的语言学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对索绪尔以来的一些传统观念一方面需要继承，另一方面又需要变革。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语言学也不例外。我们需要对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使语言学这个古老的学科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王铭玉，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符号学、普通语言学。

于鑫，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符号学、语法学。

Author:

Wang Mingyu, professor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mainly cover semiotics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Email: mywang2@163.net

Yu X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semiotics and grammar study.

Email: yuxin0696@163.com